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

理想与现实

儒家价值观与东亚经济发展

■ 于铭松 / 著

开明出版社

Kai M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133-487-6

I. 中… 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704 号

理想与现实——儒家价值观与东亚经济发展

著者 于铭松

出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印刷 保定市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大 32 开 印张: 6.875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3-487-6/I · 23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百年激荡：韦伯假说与儒家文化	
一、上帝的感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3)
二、理性地适应现世：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8)
三、众说纷纭：韦伯假说透视	(20)
第二章 拨开迷雾：东亚经济奇迹之谜	
一、沧海桑田：东亚经济奇迹	(25)
二、“三位一体”：东亚经济奇迹的奥秘	(56)
第三章 追根溯源：儒家价值系统	
一、天人合一：儒家自然价值观	(78)
二、尊君重民：儒家政治价值观	(82)
三、重义轻利：儒家经济价值观	(91)
四、舍身取义：儒家人生价值观	(101)
五、冲突与融合：儒家价值系统与西方价值系统	(108)
第四章 义利合一：东亚价值观对东亚经济起飞的影响	
一、穿越时空：儒家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120)
二、文明冲突：东亚价值观的形成	(123)
三、群体本位：东亚价值观	(125)
四、“后儒家的挑战”：东亚价值观与东亚经济起飞	(149)
第五章 风云突变：东亚金融风暴骤起	
一、多米诺效应：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156)

二、蓦然回首：东亚金融危机反思·····	(172)
第六章 劫后再生：东亚价值观的超越	
一、“黑金政治”：东亚政治的“毒瘤”·····	(187)
二、“亲亲事大”：东亚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	(192)
三、群体认同：弱化了东亚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	(197)
四、道德说教：奴化了民智·····	(199)
结 语 ·····	(204)

引 论

东亚，从地理上讲是指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大陆、半岛和海岛。广义讲东亚指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即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诸国），这大致上是儒家文化影响所及的地区^①。

20 世纪东亚地区的经济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奇迹般地崛起于世界经济舞台。1993 年 9 月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东亚奇迹”。人们在分析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时，说法不一，“结构论”、“制度论”、“文化论”，莫衷一是，但他们都涉及这样一个词——“东亚价值观”。而谈东亚价值观，追根溯源又无一不谈及儒家价值观。然而自 1997 年 7 月初由泰国铢贬值而引发的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 3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风暴过后，除了中国和经济基本面较好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底子较好的日本之外，东亚经济成为一片废墟。原来的经济奇迹已经荡然无存，其损失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像一年多前人们不断地问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一样，现在人们又不停地问奇迹为何一夜之间消失了，奇迹还会再现吗？而过去备受赞誉的“东亚模式”，在金融危机大爆发后受到许多人的指责，有人断言“亚洲模式已告终结”，“亚洲世纪在尚未到来之前就已过去”。

^① 罗荣渠：《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同否定“东亚模式”相联系，风暴过后有人连带否定“东亚价值”。有西方记者写道：东亚奇迹一夜间成了东亚危机。现在正是我们来冷静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一项“神话”——东亚价值的时候了；《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当世界被最高尚的亚洲价值观念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掩盖了最糟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同否定“东亚价值观”相联系，有人又重提韦伯的“儒教伦理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的说法，把金融危机归因于专制、裙带资本主义，归因于各种腐败，而儒教伦理正是专制、裙带资本主义、腐败的催生剂。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相互关联？

我们认为，无论是东亚经济奇迹，还是东亚金融危机都有其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因。正如我们不能同意把东亚经济奇迹仅仅归因于儒家价值观及其深受其影响的东亚价值观一样，我们也不能把金融危机仅仅归因于儒家价值观和东亚价值观。但是我们又不能忽略儒家价值观在东亚经济起飞中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本书将结合东亚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原因，探讨儒家价值观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以期正确揭示东亚经济奇迹之谜和东亚金融危机之谜。

第一章 百年激荡：韦伯假说与儒家文化

历史就是这样常常捉弄人，百年来被西方人视为贫困、落后、专制的东亚，被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宣判了现代化“死刑”的东亚地区，在战争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在风雨飘零的冷战环境中，在几乎除了人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了一片“绿洲”。面对东亚经济的起飞，经过百年激荡的韦伯假说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儒教伦理是否阻碍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试图理出它的头绪。

一、上帝的感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在东亚经济圈崛起之前的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的欧美各国经济上得到迅猛发展，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理性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时提出一种理论：理念和理想并不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理论与宗教信仰体系、社会伦理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韦伯的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和历史的方法，他通过研究、统计发现，他同时代的德国新教徒往往倾向于把子女送到技术、管理、商业高等学校学习，而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学生上这类学校的比例远远没有前者的比例高；熟练工人也是如此，新教徒家庭出身的工人，往往倾向于从事高级技术劳动和管理工作，而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工人，往往希望成为手工行业的师傅。同时韦伯发现天主教徒很少

参与现代商业活动。由此韦伯认为，新教徒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表现出“经济合理主义”或“合理资本主义”的特殊倾向。他进一步指出，作为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近代西方的特殊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掠夺性资本主义、投机性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有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才发展成了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韦伯的假设是：新教信仰在形成近代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体系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起主导、决定性的力量。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天职）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①

韦伯首先提出了宗教的感召作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对生产劳动的能量进行合理动员的结果，而这种合理的动员，则是由根深蒂固的宗教感召所推动的。新教伦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这种感召性。他以加尔文教派来说明这个问题。加尔文教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所有上帝赐予永恒生命的人……上帝都会在他预定神召的时候，以圣言或圣灵进行有效的召唤”^②，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决定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③。因此，加尔文教徒为了免受上帝的惩罚，争取获救，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有条有理的世俗活动。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在一项世俗职业中要殚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41 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 76 页。

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 75 页。

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①

韦伯还提出“天职”的概念，“天职”是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所倡导的。它要求每一个教徒加入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在其中进行终身劳动的使命。他们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②一个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最终是否得救，是无法在此岸世界中得知。只有通过完成神示的天职，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寻找到上帝之国，才能最终得救。劳动是现代工人谋生的手段，而在信奉加尔文教的信徒那里，劳动是一种天职，是得到拯救的途径，是对上帝应尽的职责。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认为，加尔文教还强调纪律与控制。“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③这种守纪律、以劳动为天职的新教徒，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勤奋、谨慎的劳动大军，正如韦伯所说的，这“必定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力的影响”。^④

韦伯指出，加尔文教认为：一个上帝的选民就要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积累财富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0页。

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0页。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0页。

诚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① 这样，新教的禁欲主义就与积极的世俗生活并不矛盾了。强烈的宗教信仰不仅不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成了经济发展的伦理内驱力。当然，加尔文教徒积累财富的初衷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通过积累财富以增加上帝的荣耀。正如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加尔文教徒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对真正的基督徒而言，财富是披在身上的外衣，可以运用财富来发展教义，一旦到了履行天职时，财富随时可以舍去，就像脱去外衣那样的轻而易举。没想到一百年以后，这件外衣竟变成了铁笼。追求财富的原衷是宗教的手段而非宗教的目的，到后来，手段却成了目的，而且成了手段变成目的这一现象的奴隶。如果加尔文教徒有所贡献的话，并不是提倡大家都为了赚钱而赚钱。因为《圣经》上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困难。这样，财富会成为宗教信仰的累赘。”^②

韦伯进一步分析了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教条不允许它的教徒消耗财富，“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③。因此教徒应当节俭，“我们不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7页。

②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页。

③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32页。

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都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的一切”^①。

加尔文教不允许教徒消耗财富，但也不允许让财富呆滞不用，教徒有义务使财富增值，因此，教徒“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②。韦伯认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的基础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③

加尔文教反对教徒将财富用于个人的肉体享受，希望财富增值，他们认为，财富增值的最好手段是投资。因此，韦伯认为：“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④

新教徒的这种积累财富而又不消耗财富并想方设法使财富增值的生活方式，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总之，新教伦理其核心就是以天职观念确证人的世俗存在的价值，并在经济行为中利用交换机会以合理性的方式取得预期利润，人们只有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新教伦理原本只是告诫自己的信徒借助于在世俗中克尽天职来获取上帝的救赎，但却通过天职观引发信徒们的功利主义社会行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37页。

②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33页。

③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33～134页。

④ 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35页。

二、理性地适应现世：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韦伯进而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支持。在韦伯看来，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伦理文化，不像新教伦理那样以理性态度改变世俗的社会力量，而是用一整套伦理规范去维护既定的社会的和谐秩序，投注在适应现存社会目标上。用韦伯话就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①。他的结论是儒教伦理不能导致资本主义，而且还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

具体说来，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以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并由此概括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三大特点：复杂而完备的官僚政治体系；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连续性；内在变革能力的缺乏或软弱。造成中国历史的这些特点的根源存在于儒教的理论基础之中，存在于儒教的载体——士大夫阶级的精神本源之中。这种精神本源缺乏一种对世界的总体批判以及根本重建的辩证结合，而只是试图去适应世界。也就是说，儒家学说不存在强烈的超验性以及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意识，不存在预言的热情和本体的道德推动力，它只是一种完全世俗化了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对传统的不屈不挠的教条化。为说明中国历史的这些特点，以及证明儒教伦理不能导致资本主义，而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农业制度、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氏族（血缘）组织以及法律等几个物质层面，分别分析了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货币制度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可以作为经济价值的衡量标准；货币作为流通的手段，能扩展经济交换的领域，有助于财富的追求与积累。货币制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韦伯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进行过无数次货币制度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传统主义……每每使一切认真的货币改革归于失败”^①。因此，中国没有形成过一套完整、系统、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缺乏资本发展的征兆，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改革，在汉代，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都进行了货币改革，当时铸币金属储备很不稳定，“每当发生战争，就需要有大量的货币供给，这必然强行导致货币改革，把铜币改造为武器。当和平恢复时，由于‘复员’的士兵任意地使用战争物资，铜则到处充斥……货币的不足或过剩所造成的价格浮动委实相当惊人”^②。国家对货币实施垄断，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屡遭挫折，这样，铸币的价值往往不稳定。而“铸币价值（币值）的大幅度变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往往使得想在纯粹（或大体纯粹）的货币赋税基础上建立起统一预算的企图归于失败，不得不再次回复到（至少部分地）实物租税，其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呆滞”^③，这就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韦伯在分析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后总结指出：“贵金属拥有量的剧烈增加，无疑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0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0页。

③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2页。

面。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相反地倒是强化了它。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地被激化出来。”^①

（二）城市和行会

市民阶层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标志之一，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城市和行会在集权主义的体制之下是产生不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的自由化阶层——市民阶层。韦伯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城市，他认为：“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议会、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执行政治力量依靠市政区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有时和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有时又和后者结盟，以争取城市的自主权。中国的都市居民常以暴动迫使官吏逃入卫城，但是他们的目的仅在于驱逐某一个具体的官吏，或排除某一项具体的法令，特别是一项新税，而从来不是一纸特许权状，以确保城市的自由。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② 在宗族、皇权、军方的统治下，中国的城市完全缺乏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更缺乏有法律保障的“自治”，因而也就无法产生经济上政治上完全独立的自由化阶层——市民阶层，而没有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就缺乏了阶级基础。

韦伯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城市的特点之后，接着分析了中国行会的特点。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工商业行会在组织上拥有和西方社会工商业行会同样的自主性，并且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宗族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8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0页。

样，……城市里行会对其成员的整个生存有绝对的控制权”^①，大多数的行会是对所有从事该职业的同仁开放的，而且入会通常是一种义务。此外，中国的城市还存在一些垄断性的商人行会，它们是国家基于财政的利益或排外政策而创立的。行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世纪的西方，行会一旦掌握了支配权，就会实际地寻求实现‘城市经济政策’。而在中国，尽管有过许多组织的城市政策的萌芽，但却从未臻于完善的境地。诚然，中国官方当局也曾一再地试图回复到赋役制度，但却无法创建出一套可与西方中世纪相比拟的行会特权制度。正因为中国的行会缺乏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只好不顾一切地走上自救之路。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缺乏像西方那样的一种自由的通过协作来调节的商业和手工业所拥有的一套稳定的得到公认的形式、并且可以信赖的法律基础。正是这样的法律基础，助长了西方中世纪手工业里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缺乏这些，乃是由于城市和行会并未拥有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缘故。”^②行会的这些特点导致了中国城市的市民阶层无法发展成为独立的、自由化的阶层，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及其不利的。

（三）家产制国家

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家产官僚制国家，由此发展出来的只能是掠夺式资本主义，而无法发展出西方近代社会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战国诸侯为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导致诸侯的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商鞅……被认为是理性化内政的创始者……魏冉，则创建了理性的国家军队制度。”^③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而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制制度，取代了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6页。

③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53页。

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与此同时，他建立了一个根据功绩与皇恩晋升的严格的官僚制秩序”^①。在这样的家产官僚制国家中，为资本或经济理性化的政治竞争消失了。在战国时期，不少出身贫困卑微的人凭借着自己的知识成为君主的心腹，获得了地位。然而秦始皇以后的封建君主，为了显耀其地位的尊严，为了使官员听命于自己，采用以皇恩代替竞争来选拔官员。“这样，纯粹东方式苏丹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在中国登场了。”^②

韦伯认为，在这种家产官僚制国家的体制中，中央集权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之间一直矛盾不断。“当中央集权化的努力一再失败之后，官职的任免权——除了某些州郡外——以及几乎是全部的财政权，最后都一一交给州郡。”^③这样，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地方官吏对中央政府的令谕往往看成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致使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高效率、理性化的行政体系，而高效率、理性化的行政体系恰恰是理性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家产官僚国家制“为了防止封建等级制的复辟，亦防止官吏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采取了一套举世闻名、成效卓著的办法：实行科举，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④。通过科举制产生的官吏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机会攫取财富的阶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一旦成为官吏，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然后，他们会用这笔钱培养他们家族成员中的优秀人才继续参加科举，等这些成员成为官吏后，会继续为自己的家族攫取财富。这样循环往复，形

①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54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56页。

③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59页。

④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63页。

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而对于富裕后的平民，要想挤进食国家俸禄的行列，惟一的方法是买官。^①然而任何政治权力的出租，都会导致社会的腐败。要想收回买官时的投入，惟一的办法是在任期内加倍地攫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以来，科举制就失去了它的初衷。在韦伯看来，由这样的体制是无法产生出西方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的。

（四）农业制度

韦伯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制度，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小土地经营，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韦伯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土地改革措施：土地分配的私有财产制、土地的国有制、土地按丁分配等等。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土地不断被分割为零碎的小块，其结果是“合理的大型农业企业无法产生……此外，只有政府保护农民的政策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此一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的积累，亦即反对将通过官职、包税、贸易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变成土地资产。正是民众的这种情绪，使国家有可能立法深入干预富者的资产……其后则一再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式的庄园领主制之复兴”^②。不仅如此，农业“技术上的改良，由于土地极度的零散化而无法实行”，从而阻碍了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进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五）氏族组织

氏族或家族这一强大传统主义力量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的，其作用也是无所不能的。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家产制政府，时常也会遭到来自下面的氏族强大对抗势力的抵抗。“官僚体制的理想主义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传统主义的势力。这一传统主义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55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95页。